

哭舒乙师

孙洁

如数家珍。当时的感觉，也是之后长久的感觉：这是一位真正的用全身心热爱着文物的管理者。

见到舒乙师之前，我已经读过很多他的文章。在认真阅读他写的各种散文和论文的时候，他最早带给我的“老舍之子”的定义会渐渐地很稀薄。在我的阅读经验里，他就是一位散文家，偶尔会写一些关于他父亲的或者深情，或者充满趣味的文字而已。当时，我读过他写的《悼杨梨》（好像是叫这个题目）和《哭任宝贤》，都是登在《文艺报》上的，从那些深情怀念挚友的文字里，我读到了悲天悯人，读到了风趣睿智，读到了惺惺相惜，也读到了人以群分。

就在那天，带着我们参观完文学馆之后，他又请我们在文学馆门口的小饭馆里吃了简单的午饭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苦瓜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把读《哭任宝贤》的感受复述给他听，问他一些他在文章里没有完全吐露的事情，他都一一告诉了我。1988年，北京人艺到上海演出，我爸带我看了任宝贤的好几个戏，对他印象特别深刻。不料不久以后看到的一篇关于他的文章竟是舒老师写的悼文，实在是非常震惊。《哭任宝贤》和舒乙师的其他文章一样，清通流畅、真情流露，却因为怀着克制的深情记述令人读时泪洒衣襟。

午饭后就到了分别的时刻。我们问他坐一个什么公交车怎么走，这时，在饭馆门口，舒老师跟所有的北京人一样大大咧咧地一指：“往前一百米就到！”

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还没走到。再后来我慢慢地正式步入老舍研究的行列，和他见面也变得规律起来，一般是每过两三年在开学术讨论会的时候会见面。因为我觉得他越来越有名，也越来越忙，聊天就不再那么深入了，写信也渐渐少了，慢慢地发展到只是过年通一张贺卡。但有几次舒老师到上海开展展的时候，会把请帖发到我和史承铎老师家里，我们会去参观他的画展，顺便和他闲聊几句。

2012年11月，在福建漳州开老舍会。刚报到不久，吃午饭的时候，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。我回头一看，是舒乙老师。他把一本书塞到我手里，说：“这是新写的，送给你。”这本书是写北京和承德的藏文石碑和藏式建筑的，叫《见证亲密》。我知道他这些年一直在为保护北京的古建筑较劲，想来书也是成果之一吧，就高兴地收下了。展卷一看，名已签好了，落款日期是10月15日，原来是十月份就签好了带来的，又特地拿到餐厅来寻我。

再后来的一次会议是2014年很多老先生一起到俄罗斯开会，舒乙老师因为在苏联留学过，听说又当导游又当翻译，玩得很尽兴。但那时因我已经远赴澳大利亚陪教，所以没有去俄罗斯，也就错过了最后一次和他老人家盘桓的机会。

人生就是这样，以为一直还会再有的事情，突然就中断了，再也没有了。以为不久又会见面的人，以为错过这次还有下次，突然就没有下次，再也不见了。

我刚读了一篇马未都先生写的悼念舒老师的文章。他说，舒乙脑溢血之后，在床上躺了八年，这几乎是他人生的十分之一的时间。虽然舒老师在床上并没有躺这么多年，但，没有八年，也有六年。想想就难过，这是一段多么难熬的岁月！不知道这近六年的漫长黑夜他是怎么过的。不知道在这漫长的看不见星光，看不见五彩，看不见他热爱的北京城的光彩里，会不会有那么一个瞬间，他会想到过我。

2021.4.23

很多年前读过钱穆的《民族与文化》《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》等著作，敬佩他的道德文章，也了解他与苏州的渊源。1927年钱穆在苏州中学做老师，1929年与苏州姑娘张一贵结婚，1930年在苏州人顾颉刚的介绍下到燕京大学任教。抗战爆发后，钱穆随校内迁，他的妻子张一贵带着儿女仍生活在北京，他的老母亲居住在无锡乡间老家，直至1939年夏天他们相聚于苏州。钱穆化名归来，在耦园隐居一年，撰写了《史记地名考》。

1940年9月下旬，又恐敌伪的胁迫，钱穆忍痛放下病中老母和娇妻幼子，匆匆离苏，远赴昆明西南联大。从此，钱穆与家人一别六年，一通通南来北往的书信，带着战火的硝烟，寄托着彼此的思念与牵挂。这些从耦园寄出的抗战家书，因时代激变仅仅保存张一贵致钱穆的一部分，它们和钱穆子女回忆钱穆的文章，如同一卷卷家庭档案，书写了一个家庭在战火年代的悲欢离合，曾经的亲情、思念、不舍、天真、忧虑、隔膜从文字中跳出来，拼凑成一幅令人伤感的历史画卷。

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在苏州的张一贵盼着丈夫的手札，在西南的钱穆盼着妻子的家书，都想等到对方的书信后再回复。当战火使通信不能正常之时，他们约定每周互致对方信函。钱穆的书信在特殊年代未能保存下来，而今成为《钱穆家庭档案》上篇的“家书：此情可待成追忆”，均为抗战时期张一贵与儿女们写给钱穆的家书。知识女性张一贵的两地书自1940年9月28日至1945年11月18日，这些书信被钱穆“废物利用”，他在信纸背面撰写零星的读书札记。钱穆离开苏州的第三天，张一贵写下第一通家书，表达“颇念”的心情，表示会按照他临行时的嘱托，专心做好“事母育儿”两件事情。其时张一贵已

“乌干菜”是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绰号。他是从隔壁村转到我们村小来读书的。他们有两个同学一起转来，都是男生。报到那天，老师叫他俩站到讲台上，介绍给我们认识。他们别别扭扭地站在那里，一个黝黑精瘦，一个白净壮实，乍看之下，极富喜剧感。精瘦的那一个，从脸到脚，一身看得见的皮肤，黑得发亮。乡下娃，天天晒的是日头，黑是不奇怪的。但我们好像还没见过这样彻底的黑，油亮的黑。给他一衬，站在他旁边的男生，简直面白如玉，体面极了。我们乡下形容一个人黑，常说，“晒得跟乌干菜似的”。第二天，他就有了这个绰号。

老师在教室里加了一张新课桌，他俩的座位就排在那里。上课的时候，我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老师的提问，却从没见过他俩站起来回答问题，也不知道是他们没有举手呢，还是举了手，老师没有看见。下课了，大家照例玩作一团，他们呢，有时腼腆地站在一边观望，有时干脆走到外头去晃荡。只有体育课上，老师说要跑步测试，叫我们两两一组，从礼堂的一头跑到另一头。女生组跑完，该男生组跑。轮到“乌干菜”了。礼堂里光线不好，他又黑得黝黝的，站在那儿，几乎要看不见。谁知发令号一落，他跑得那个快啊，把同组的另一个男生远远甩在后头。老师把秒表一掐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跑得蛮好。”我们第一次对他刮目相看。

后来发现，“乌干菜”平时笑笑，真的打起架来，也很不含糊。乡下有句老话，“小小刀要快，小小人

要厉害”，说的好像就是“乌干菜”这样的人。

夏天到了。老师把男生们都喊出去，他们一起从储藏室，呼哧呼哧搬回来一面又长又大的木头桌子。这张桌子，本来是给高个子的男生午睡用的。课间的时候，它就成了班里临时的乒乓球桌。大个子张铁军，上课经常挨教鞭，乒乓球却打得最好。第二天，他来上学的时候，书包里揣来了白色的乒乓球一副自制的木头球板。一下课，十几个同学呼啦一下，全围到球桌边。张铁军指挥着大家，往桌腰中央低低地放上两摞砖块，横搁上一根扫帚柄，就是中线。所有人要分成两队，才好开打。怎么分？他指定另一个男生先跟他对垒，一球一胜负，按照先后顺序挑选第一组队友，依此类推。第一个球结束，大伙儿都拍着球桌嚷起来：“选我！选我！”张铁军的样子，真是不可一世。他提溜着球拍，往人群里神气地一指，被选者犹如中彩般，高高兴兴走到他身边去。

选到最后，剩下的三两人里，总没有我的份儿。其实我的体育也不差，就是对球类毫无感觉。操场上扔垒球，我能把球扔到隔壁的水田里去。我也爱打乒乓球，只是那些从对面飞来的球，看着稳当，被我一接，不知怎的，就弹到远远的角落头里。渐渐地，就成了乒乓球桌上的零头，总是分到最后，没有挑拣的余地了，才给顺便捡走。当零头的滋味不好受，可也没有办法。这是对打，换成是我，我也不愿意选个不会打球的队友，白白了本队的士气。

“乌干菜”和他的同桌也给剩在

最后。大概因为他们是这场游戏的新到者，惯性使然地，没有人先挑他们做队友。张铁军皱着眉头，擎着球板，挑瓜似的冲我们三人点来点去，勉强挑了我，算是对熟人的照顾。他的对手挑了“乌干菜”的同桌，大约他的个头高些，感觉在球桌上更张罗得开，尽管这个同桌还好心指着“乌干菜”说——“他打得好”。

球桌边，只有精瘦的“乌干菜”一个人站在那里。

张铁军很豪爽地一挥挥手：“‘零头’归你了。”一般说来，碰上这种“零头”落单的情况，对垒的主将双方还得象征性地开一个球，用来判定“零头”的归属。这个球，打得最敷衍，但好歹还有一胜一负、胜者增员的意思。“乌干菜”连这个资格都被取消了。看得出来，他挺不高兴，铁青着脸。不过因为他的脸本来就黑，也看不出太大变化。

于是开打。第一轮还没比出结果，上课铃就响了。我们赶紧回到座位。等到下课铃一响，呼啦一下，大家又围到球桌前。眼看张铁军先裁了对方，张铁军索性打起了抬抬球。这是一种特定的打法，不管发球还是回球，故意把球抬得奇高，专门逗弄不在行的对手。一面抬，一面还有边上的队友助威：“抬——抬——球”。这个“抬”字，要往上扬，还要拖得尽可能长。按照规矩，如果对方队员全部在他手里落败，这一天的球桌就归我们队所有。我们都预备好了，只等他打败最后一个，就排到球桌对面，再跟他对着打。

“乌干菜”最后一个上场。他绷着脸，咬着唇，显得两颊更瘦，脸色更黑了。我们甚至有些同情地看向他。只见他从球桌上提起球板，掂了掂，一个球开出去。嘿，这球快得！张铁军连忙接了，同时说了声“噢”。只见回球打了个旋，没有落在球桌上，飞了出去。

大家都不作声了。“再来一个！”张铁军并不气馁，却也不轻敌了。“乌干菜”呢，把两个精瘦的手臂微微悬开，候着来球。他们的球打得急起来，球桌上乒乓球乒，看得我们伸长了脖子。忽然听见老师在敲讲台，大家猛地醒悟过来，上课了！原来连上课铃响也没有听见。下课了，接着打。本来是四盘为定，他们一共打了近十个回合。最后，“乌干菜”胜了张铁军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“乌干菜”的爸爸是木匠，给他锯了好几副球板。他家里还有一个红双喜的乒乓球拍，一面是板，另一面贴着厚实的红胶皮。难怪他的球拍打得又快又好。

“乌干菜”跟张铁军一样，一直打到我们这边最后一个队员上场。最后一个就是我。他没有给我吃抬抬球。当然四盘我还是都败了。这样，他又跟张铁军碰到了一块儿，这就该重新选队员了。

一向选队员的都是张铁军和另一个能打的男生，现在忽然冒出个新手，球桌边热闹起来，都想看“乌干菜”怎么选。头一个，他挑了他的同桌。大家情不自禁地点头，再看他怎么挑第二个。他眉毛也不扬地，往我身上一指：“她。”这就明显有点抱不平的意思了。好在大伙儿也不见怪，分完了组，乒乒乓乓，继续对打。

后来我到底没上场，表现怎样，都不记得了。但记得头一次在球桌上受到如此优待，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。那天走过他的课桌，我对“乌干菜”说，你的球打得好。他笑了笑，也不说话。只是每次打球，只要轮到他的挑队员，我一定排在前列。

这样一打就是两年。我们平常也不搭话，走到球桌边，不知怎的，就有一股患难与共的冲动，不由自主地升起。

再后来，大家都转到镇小去读书，不在一个班了。有一次，从学校回家的路上，忽然又见到了他。我高兴地喊他：“嘿，乌干菜！”他斜挎着一个布书包，转过头来，对我笑笑，露出一口细白的牙齿。也许是他的脸黑，衬得牙齿白极了。

他的笑容，到现在我还记着。

京华遗韵——漫步银锭桥（油画）李秀实



从耦园寄出的家书

——读《钱穆家庭档案》

沈慧瑛

身怀六甲，即将临盆，三个儿子读小学，一个女儿上幼稚园，最大的十岁，最小的五岁，生活的重担落到她一个人身上，但她无怨无悔。当时汪伪已知钱穆在苏州，威逼利诱在苏州难为，为保持中国人的气节，张一贵无条件支持他逃离。她深情地对丈夫说：“我只把你的心做主宰，你的话做依归。”因为对钱穆的爱，张一贵孝顺婆婆大人，几乎每通信中都要报告母亲的起居、饮食、诊治等情况，以宽慰游子对慈母的思念。张一贵因身体不好，提前产下他们的小女儿晦（后改名粹），出院后即致函钱穆，告知母亲的情形：“母亲十天没有见面，觉得面色很好，食量也不差，一碗半一顿，喜欢吃红烧肉。一元钱肉，单烧开了，吃四五天，老人家很高兴”。当时生活并不宽裕，但她给婆婆开小灶，还购买鱼肝油补充营养，老人家一旦不适应即延医治疗。当老人出现“似病非病”的“老态”症状时，她自晨至暮侍奉在旁，并每天花一元钱给老人买酱鸭、酱肉、水果、点心之类，让老人家吃的就随便吃。张一贵不忘教育儿女对祖母尽孝，“以祖母为中心，小孩们回家，总先问祖母好不好”。张一贵是一位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女性，但依然恪守传统孝道，在教师、妻子、母亲、儿媳的角色转换，

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辛劳。

甜蜜的爱情是张一贵与钱穆步入婚姻殿堂的前奏曲，婚后生儿育女的艰辛，柴米油盐的操持，成为他们生活的主旋律。开门七件事要安排，收支账要核算，人情往来要应对，儿女学业要辅导，张一贵在书信中不厌其烦地向丈夫一一诉说这些家常琐事。生活就如一地鸡毛，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务诸事，在非常时期全靠她一己之力苦苦支撑，维护了家庭的和美安乐。但夜深人静之际，张一贵牵挂远方的丈夫，关注他的冷暖。一种相思，两地忧愁，温情流淌在她朴实无华的笔端。因为思念，她难以心安，所以说：“我接不着你信，脑筋就会不清楚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”她在信中絮絮叨叨关心钱穆的饮食起居，商量着内迁团园，说“为着你身体的健康，为着你缺少家人的温存，为着你饮食的调养，我们的迁内是必然之理”，终因洛阳战事以及孩子弱小，使谋划多次的西行终究流产，团聚成为空想，以致她说“恨我不能即来为你照顾一切”。战争让多少家庭流离失所，又让多少家庭支离破碎，但希望还在，她在信中表示：“如再过一两年能得我们见面者，我愿忍一切痛苦，以待来日也。”她偶尔向钱穆诉说离别之苦与盼望团聚之情：“相

离了四载，一切的一切，只感到空虚、孤单，何日何时相聚！愿上帝给我们开路，放出曙光，劈开光明大道，任我们行走，那是快乐幸福的时候。”

这些带着她个人思虑的话语，流露了她作为一个女子对丈夫的思念以及内心的孤独，而这种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语句在她的家书中很少出现，她更多地是向丈夫汇报家中老小亲友的身体、学习、工作情况以及人际交往、柴米油盐等尘世烟火。其实，再坚强的女子也有柔弱的一面，但这柔弱的一面始终被她遮掩起来，或许为了让远行的钱穆安心。

为母则刚。张一贵为儿女撑起一片天，时刻关心他们的健康与学业，合理安排他们的一日三餐，还要为他们缝衣纳鞋，曾在两星期内做了十一双棉裤，让天真烂漫的儿们享受浓浓的母爱。但孩子对父爱的渴望不是母亲所能给予的，当女儿钱男生病时，特别思念远方的父亲，一个人在床上自言自语：“爹爹欢喜我，横抱三年，竖抱三年，抱到六岁才不抱。”钱穆离家半月后，钱粹才出生，她对着照片叫“爸爸”，她不会写字，就画几个圈，说是给爸爸写信，叫爸爸回来，说说是给爸爸写信，叫爸爸回来，“横抱三年，竖抱三年……”幼小的孩子不懂得母亲的苦，见到其他小朋友有爸爸，就经常向妈妈要爸爸，张一

贵来信中如是说。孩子们渴望父亲的怀抱，做妻子的何尝不想靠着丈夫的胸膛休息片刻呢？

很多年后，钱易说：“尽管被父亲留下来的两封家书中的一半告诉我们，那个年代里他们之间是多么相互牵挂、恩爱，孩子们的安危和成长又一直是他们共同的关注，但他们毕竟分离得太久了。”分离太久，就容易产生隔阂。无法跨越的鸿沟屏蔽了彼此的音信，又如一道深深的伤疤，刻在彼此的心坎上。当三十多年后钱穆与儿女、孙辈团圆之时，张一贵已默默地离开了人间。

钱穆回忆在耦园著书立说的时光：“侍母之暇，晨夕在楼上，以半日读英文，余半日至夜半写意撰《史记地名考》一书……余先一年完成《国史大纲》，此一年又完成新书，两年内得成两书，皆得择地之助，可以终年闭门，绝不与外界人事交接。而所居园林花木之胜，增我情趣，又可乐此而不疲。宜良有山水，苏州则有园林之胜，又得家人相聚，老母弱子，其怡乐我情，更非宜良可比，洵余生最难得之两年。”

钱穆在忆师友的文字中鲜有对张一贵的评价，但这段话中隐藏着对张一贵的无声赞美，正因为有她从容应对家里家外的杂务，才使他一门心思读书写作。

《钱穆家庭档案》是一部知识分子家庭的抗战叙事，是一部中国女性坚忍不拔的奋斗历史，更是一部传颂孝道、抒写亲情、诉说相思、教育儿女的传统家史。因钱穆的光彩照人，让我们忽视了曾经站在她身后的为她养儿育女、无私奉献的知识女性——张一贵。时光老去，但张一贵的所思所想所爱化为一个个文字，穿越时空，又来到耦园的亭台楼阁浅唱低吟。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二维码